



中國天主教近十年的起伏

新加坡中華公教聯絡社主任 沙百里著
李斌生譯

一九七八年的聖神降臨主日，在北京南堂內，當拉丁彌撒完畢後，我首次能私人地與負責堂區的三位司鐸傾談。因參與那彌撒的三十多人都是外國人，我們很少談及當地的教友情況，可是其中一位司鐸說他自己開始教授數名青年拉丁文。當時我心內想，只有那些有興趣晉鐸的人才肯學習拉丁文的。可惜那數天被一些沉默的氣氛所濃罩，而很多事只有留待猜想和推測。當時南堂是一九六六年文革陰雲出現後在全中國唯一重開的天主堂。

四年後，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重回北京，而面對的已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教會。我在王府井大街的聖若瑟堂（東堂）參與彌撒，那裡擠迫著很多人，他們熱情奔放地詠唱傳統的中文彌撒禱文。彌撒完後，一位聖母小昆仲會兄弟興高采烈的告訴我，關於他曾在當地電視看到教宗訪問花地瑪和英國的過程。當我再到南堂時，那些司鐸熱烈的邀請我到他們的宿舍，坦白率直的談論新加坡的教會、梵二的文獻，以及利瑪竇的傳教精神。他們更指出自從我上次的探訪以來，在整個國家內，已有二百多間教堂重新開放。

這四年中的改變真叫人驚嘆，但這只是中國教會一個普通復甦的開始。這現象還延續到現在。十年間，一個新的教會正在形成，

在架構和內在生命上重新整頓。這教會曾有根深蒂固的公教傳統，現已擁有一群本地中國人作為領導，接受著一連串重大的挑戰。他們重整教會生活內基層的部份，在不久的未來，這中國教會將會對普世教會的生活作出獨特的貢獻。

現在讓我們重溫這進展過程的主要階段和簡述一些顯著的特色。

優先解決崇拜問題

在一九八二年，曾有二百間教堂重開，大多數都位於大城市，外地訪客都可從這件事中獲得在中國已有宗教自由的證據。有些人也許認為這一切只是一種宣傳的手法。但在一九八二年後，更多的教堂繼續重開，很多更處於荒僻地域，根本沒有任何外國人會踏足的。關於採用過時的禮儀和拉丁文的問題，中國教會領袖很迅速的回答，他們現在所要急切解決的就是重開教堂。

一九八四年聖週，經過山西省太原時，我被一大群信眾的虔誠所感動，他們耐心地在數小時冗長的巴斯卦午夜禮中跪拜著。一位司鐸說這些教友對於在二十多年後能有機會參與彌撒和領聖體覺得很感激，他們更在禮儀中盡情痛泣。很多教友會步行兩三天，心裡只想在聖誕或復活節內參與彌撒。在成

都，聽說有些是來自藏族山區康定的教友，他們攀越高山，經過海拔四千呎的地方才能抵達。在廣東肇慶的一位本堂司鐸談及二十多名盲人教友，願花一天的時間乘船來參與主日彌撒。現在，如果地方有多過一百多位教友，而又幸運地能獲得一位司鐸答允照顧的話，他們就可申請重開教堂；這已成為當地政府的措施之一。

重開教堂能成為較重要的措施，理由有二：第一，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只容許宗教活動在官方批准的宗教場所內進行。公開的宗教崇拜普遍來說是不能在這些地方以外進行的。這政策方便政府登記所有進入教堂的人，控制大局。第二，中國教友是以教堂為中心，他們認為教友生活最主要就是守主日。根據傳統，天主教的信仰實踐就是數小時逗留在教堂內，早禱、唸玫瑰經、參與彌撒、拜苦路、唸禱文和誦讀信仰要理。直到現在，仍可發現一些中國教友每主日在教堂內進行三至四個小時的祈禱。平日彌撒也有很多教友參加。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大清早便前往天津的天主堂，而剛巧正有五百多教友高聲詠唱追思彌撒。前年，我乘一輛夜班火車到西安，抵達教堂時還未夠早上六時，出乎意料之外，一位神父邀請我舉行彌撒，我喜出望外地應允了。這台拉丁彌撒使我回憶起二十五年前初昇司鐸時的禮儀。當時教堂有四十多人，他們誦唱著中文彌撒經文，我不知不覺地忘記誦讀最後一篇福音，但這似乎沒有騷擾他們虔誠的祈禱。

聽說在很多地方，年老的教友因自幼已開始學習熱愛古舊禮儀，又經多年的封禁，因此不願意接受古舊禮儀的更改。年長的司鐸也特別喜愛傳統的羅馬禮儀。可是，在一

些有很多年輕教友或對外接觸較多的地方，教友們都很熱烈歡迎梵二後的新禮儀，儘管禮儀書籍很少，也沒有教務委員會的正式指示。這委員會早在一九八零年成立，目的是在牧民方面，與天主教愛國會攜手合作。

政府認可的教會領袖原則上沒有反對在禮儀中採用中文，但他們希望能有層次地慢慢改革。一個全國性的禮儀委員會現已成立，也正準備安排一套教會特准的中文經本。有些教友提出兩個理由來邀請委員會編撰自己的經文：一來可加強中國教會的嚴格獨立自主，二來可揀選一些語文更適用於大陸教友。其他教友則提議採用香港或台灣的現有翻譯版本，他們辯稱這些翻譯也是《中國出品》，而且已被中國多處地方採納。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經過偏遠的新疆省首都烏魯木齊時，在教堂內我特別欣賞他們把傳統額得略音樂巧妙地運用到中文唱經中，而所用的感恩祭經文又與現時台灣和新加坡所採用的相同。

去年聖誕，在上海的佘山，聚集了一百三十名修士，感恩共祭就是以中文舉行的。同年聖神降臨節，三位新加坡中聯會員在中國東北的吉林參與了當地李雪松主教為一百多名教友施行堅振聖事的彌撒，他們感覺很自然，因全部經文採用中文。當地人告訴他們，在大城市，因有很多年輕的司鐸和修女，所以禮儀可採用中文。但在其他地方，年紀較大的教友根本反對停用他們已熟悉的古舊彌撒經文。

分擔現代化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視宗教為一件絕對私人的事，固不能影響社會事務。信教者可藉著他們的個人宗教信仰來拯救自己的靈魂，但在社會

上他們一定要做個好公民；這觀點當然沒有和傳統的天主教教理有抵觸。最近，天主教教理在中國翻印，開端問答就是：『你為什麼生在世上？』『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

一九七八年，統戰部的政策是推動所有社會階層，包括有信仰者，來肩負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八二年六月份《紅旗》雜誌的一篇文章詳細地指示所有黨領袖，該怎樣訓練積極份子去帶領有信仰者更熱心參與國家的經濟和社會進展。北京出版的《中國天主教》雜誌，現已有一專欄介紹在團體服務中的模範教友。最近，來自河北省北部的一位司鐸因在本省領導推行全國性的綠化計劃而受到各處好評，一些南京教友因其傑出服務而被譽為模範工人。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在上海成立，一些醫生成員志願以他們的醫療才能為病人服務。一九八五年後，中國已歡迎外地協助，尤其是在語言教育、訓練師資、農地發展、照顧傷殘等方面。一九九零年，香港明愛仍在中國不同地區支援二十多種這樣的計劃。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陪同一組法國教友旅遊中國，包括一位主教、六位司鐸和十五名教友，全部都是法國公教進行會中富有經驗的成員。在北京的時候，他們詢問傅鐵山主教很多關於教友參與中國社會事務的問題。正如在其他類似情況下一樣，他回答說：『他們就是地上的鹽，愛天主不能與愛世人分開。』這是很真確的答案，也是對基督徒服務世界的信仰解釋。但這解釋必須與共產主義對宗教的觀點相協調，因他們視宗教為一逃避，逃避現世的痛苦而進入一個企望來世獲得永遠賞報的夢境。一個堅信馬克思主義

的思想家亦會因此而滿足，因他感覺到信教者即使有信仰，仍可成爲一個好公民，但他不明白這些信教者能成爲良好公民，是因爲信仰推動著他們。

這兩個觀點的分別在《中國天主教》雜誌中同時刊登出來。有一篇文章在介紹模範工人時，抨擊教友不應受歧視，因他們也和其他非教友同志一起工作。同一雜誌的另一篇文章則由一位主教或司鐸執筆，強調他們獨特的團體服務是由於他們對天主和對國家的愛所激發。

很多主教和司鐸因研讀教會憲章，比如：梵二的《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得益不淺，尤其是在闡釋今日基督徒服務社會的神學上。天主教友和共產黨員雖然在原則基礎上分歧，但實際上也可以尋找共同點。當然，天主教友表面給人的印象是純粹個人對精神方面的傾向，但當中國政府推動教友糾正過去，鼓勵他們更熱心於社會公益的時候，無形中也給教會提供了一份寶貴的幫助。

培育司鐸和修女接班人

雖然是基於不同的動機，但教會和政府正有著一個共通的關注，就是培育未來的教會領袖。文革後重出活動的司鐸年紀已過六十多歲，在監獄和勞改營中所受的痛苦已削弱他們的體力，不過他們的精神還很堅強。他們知道能為教會服務的時間無多，所以他們竭心盡力去培養聖召和訓練年青接班人。他們的期望就是看到教會的生存，所以他們團結一致教導年青人拉丁文和信仰知識。年青人因受這些老一輩司鐸的堅強信德所感染，很願意奉獻他們的一生為教會服務。這些青年大多來自農村家庭，教育程度不高，也很

少有機會獲得信仰的基本教導。

共產黨政府也體會到訓練天主教領袖來落實他們的宗教自由新措施的重要性。他們希望培養一批有才幹的青年成為宗教工作者，而且在參與國家建設上有穩固的政治培育。當局知道司鐸候選人需要具有相當的宗教知識，才能爭取教友們的接納和尊敬，但也需要具備充足的政治培育，才能在推行現代化的積極任務中領導天主教團體。

第一間獲政府正式批准開設的修院，是上海郊外的佘山修院，於一九八二年十月開辦。三十多名修生搬進在佘山中山教堂後面的司鐸養老院房子內。日後升任上海主教的金魯賢神父當院長，他設法集資在山腳下興建一座新的修院院舍。這新修院院舍可容納一百五十名修生。金主教在沒有抵觸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原則下，接受西德教友的經濟支援，和接受美國和台灣捐贈的二萬冊書籍。一九八九年開始，金主教更開始邀請台灣和香港的教授幫助改進修院的神學課程。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他創辦了《天主教研究資料匯編》刊物，內容包括台灣、香港刊出的文章，以及英文、法文雜誌的譯文。這本雜誌現由上海光啓社出版，一九九零年春已出版第十七期。大部份文章是介紹梵二後的神學，特別注重於聖經、禮儀和教會學，因此這本雜誌已成為培養現代和未來中國司鐸的寶貴工具。它在中國各處已廣泛地被採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經過廣東省湛江的教堂時，看見本堂司鐸正在教導十七位年青修女望會生，她們的手中各自攜有一本《天主教研究資料匯編》。

因為佘山修院開放與外界接觸多，國外人仕往往覺得它是中國修院的表表者。但在

中國內，人們都知這榮譽該屬於一九八三年九月開辦的北京全國神哲學院，它位於中國愛國會總辦事處的同一樓宇內。這學院採取嚴格獨立自主的方針。院長涂世華主教和副院長王子澄神父（一九八七年被選聖為主教），不畏艱辛的翻譯和整理他們年幼時背讀的傳統拉丁文課本。雖然這些舊拉丁課本是在西方半殖民地時代傳入中國的，現卻奇怪地成為中國的祖業。至目前為止，中國修士難有機會接觸到從外地進來的書籍。北京全國修院所編寫的中文課本被分派到沈陽、成都、武漢、西安等省級修院，這些修院都是在一九八三年後重開的，也分派到各教區級的修院。修院的校董均經常聚集研討，所有修院的課程和教材應獲得北京全國修院的批准。

目前估計約有五百至七百名修生在政府認可的修院內攻讀，修院培養出來的修生已有二百多名晉鐸。這批新神父很熱心於牧靈工作，很切望收到中文的禮儀經書和日課，也很渴望閱讀一些能補助他們在修院訓練中所缺乏的書籍和文章。

年輕的修女也積極投入牧民工作，特別是到一些缺少神父的村落去幫助教友團體。已解散很久的修會，從一九八三、八四年開始各自重新組合，年老的修女很快就吸引無數年青女子參加。一九八四年四月，吉林的本堂神父很高興地向我介紹十位年老的隸屬教區的聖家會修女和四名年青的志願修道者。一九九零年六月，年青入會的增至三十人。於八八年發了願的十名修女中，七名已被派到郊外的村落。目前，九位初學修女在完成她們四年的培訓後，也會在九月發願；其餘二十一名正接受第二年的培訓。修女們很著重神修培育，特別喜歡收集福音默想和聖人

事蹟的書籍。

一九八四年，在一次南中國的旅程中，我遇到另外一件驚喜的事。經過數小時在廣西美麗的柳州市街道上毫無結果的尋找後，終於在黃昏找到天主堂。堂內認識了已屆高齡的本堂蒙神父，他正在收聽一卷聖樂錄音帶。與他傾談數分鐘後，他突然失陪而前往敲動教堂的大鐘。隔了一會，房間已擠滿二十名年輕的女子，由一位年老的修女陪同著。蒙神父解釋這些女子都因為她們的家庭作了很大的犧牲才能進入二年制的教理、禮儀、聖經，以及縫紉、醫療和其他技能的訓練課程。她們須要在早上工作謀生，晚間才有時間讀書。這些志願修道女子標誌了聖家會在這地區中的復生。訓練完畢後，她們每兩三人一組的被派往村落中的教友團體服務。她們常受到村民的歡迎和支持。有些還被派遣至廣西、廣東的其他城市協助同類的團體的培育工作。

隸屬國際性修會團體的修女們，也在主教或主教任命的神師們的領導下重新組合起來。培育期間會隨當地要求長短不一。但總括來說，都著重於靈修的培育。在某些城市，爲了需要增加收入，地方愛國會加給她們更多工作量。這些工作雖然能支持教會的自養，但可能導致教會生活的真正意義的損失。

促進經濟自養

自治、自傳、自養就是中國政府希望建立一個獨立自主教會的基本條件。中國教會領袖大致也同意，承認這三個原則對於建立一個能負起責任的地方教會是必須的。但三自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是否含有與普世教會分離的意思。中國教友曾被迫用「對外國帝國

主義的鬥爭」的名義去反對教宗，所有外國傳教士也因此被逐出國。結果中國教會差不多經過三十年時間處於隔離的情況。

雖然中國教友在這過程中十分痛苦，卻取得積極成果。當然這不是五十年代期間當政治壓迫加強時所能看到的。文革後，教會又復甦了；她起死回生，現進入一個繼續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那些曾退縮或怕事的司鐸現爲情勢推動而重出負起領導角色，擔當主教或修院導師等。在外國傳教士衆多和執權時代，本地司鐸從未有過如此衆多機會運用他們的才能治理教會事務，或向他們的同胞傳揚信德。在勞改營中，他們曾使人歸依；現在享有自由後，他們繼續爲成年人講道理，和爲教友家庭的年青人組織慕道班，因爲他們以前沒有機會學習信仰。年紀的老邁沒有減滅他們的熱忱。有些年老的主教雖然已屆八十高齡，但在過去數年中，曾爲數千人施行堅振聖事。

縱然聖神很活躍及仍然施行奇蹟，但最大的障礙還是經濟方面的缺乏。很多有志做神父或當修女的青年，因經濟問題而被迫等候，不能立刻進入修院。過往中國很多教會組織都靠外地經濟支援，而教會亦因此像似外國投資企業。當時教友習慣被動地接受各種設備、工具及甚至生活費用；也許這是由於當時很多教友都是貧苦的農民或漁夫，常受政府的苛刻徵稅，加以在饑荒、疾病和戰爭蔓延之際，又受土匪們的剝奪。況且，外國傳教士無論在任何地方，已習慣了按自己家鄉情況建築宏偉的教堂和宿舍，超越本地人的水平。傳教士離開後，這類物業就成爲本地團體無法負荷的重擔。這些物業終於被政府充公，分給各類單位，屢屢用作市民的

住所。

爲了落實宗教自由政策，政府現正將以往一些被充公的教會物業逐漸歸還教會。宗教事務局和統戰部的高級官員都一致承認，如果教會被剝奪她基本生存的條件，便不能期望她盡早自立。可是地方的黨領袖在落實這政策時，各施其政，更有一些爲了個人的利益斤斤計較，只歸還一小部份而已。一九八八年八月，甘肅省平涼的馬驥主教公開抨擊這種濫奪教產的情況，亦抱怨愛國會的不盡職責，類似馬主教所提及的甘肅情況在全國各地亦有不少。貪污、剝削等例子層出不窮。據聞廣西南部某城市負責教會事務的教友出售教堂土地，替自己買了一幢房子；目前控辯雙方在爭持中。其他地方，一些教堂物業從前被改作民居，物業現在按原則該歸還教會，但住客拒絕遷離，也不願付租。如果天主教團體希望取回教堂，他們必須付出一筆龐大的費用去安置佔住的居民。

自一九八五年起，所謂「獨立自主」的教會開始愈來愈明顯脫離自養政策。各地主教和司鐸不但獲得政府批准，還受到鼓勵去獲取海外援助來支持重建教堂、男女修院，以及興辦旅館、工廠、飯店等「增加收入的計劃」。當地宗教事務局幹部和愛國會領袖也因海外資助機構的捐助而獲益，比如：可以借用捐贈的小型貨車和其他儀器等。一九九零年，數名管理宗教事務的幹部因貪取教會專款而被拘捕。

與上述團體成對比的是那些「忠於教宗和普世教會」的靜默天主教團體，他們可說享有更大的獨立自主。他們依靠信眾的支持，生活貧困，外來經濟援助很少，通常是來自東南亞、美洲及其他國家的華僑朋友和親戚。

他們并不依靠自己政府的施惠或海外的幫助來維持生活。其實，他們不應被稱爲「地下教會」，卻應被稱爲「獨立自主的團體」。

當這些獨立自主的團體看到親近愛國會的教友獲得政府和海外天主教資助機構的協助時，或會感覺不高興。這經濟支援問題或許能局部解釋，爲什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部份這類獨立自主團體變得更爲偏激，嚴厲攻擊那些到愛國會主持的開放教堂參與彌撒和領聖事的教友。

但是在中國很多地方，上述問題都沒有發生。這些本地團體生活在貧苦的情況中，與本地居民共苦同甘。

爭取羅馬的認可

這些獨立自主團體不滿政府和海外資助機構的經濟援助流入政府認可的教會中；這是一位地下主教在一九八八年所發表的「我對愛國會的看法」的二十二點中的一點。該聲明指出引起不滿的最大原因是信仰的問題。獨立自主團體成員既要做個好公民，不會因政治理由攻擊政府，同時也想做個忠心的天主教徒，承認伯多祿的繼承人教宗所擁有的首席權。他們視「否認教宗權力」爲逐漸侵害公教信仰的完整性的第一步。一九五零年時代，司鐸們因跟隨庇護十二世的勸諭和中國主教的領導而堅持反對態度。他們由於這種堅貞，備受監獄和勞改營的痛苦。直至如今，他們仍在半被監視、半享不穩定自由的光景下生活，但他們仍大膽地展開牧民工作。這些司鐸，除親友外，不准和任何外界人仕接觸。隨著公開教會和外地教友頻密的交往接觸，他們愈感到自己孤立和漸漸被國際天主教組織所遺忘。此外，政府於八零年代推

行較容忍的宗教自由政策，導致很多天主教徒因渴望能公開崇拜和領聖事而接受與愛國會合作。

中國某些地區內，非常忠心的教友仍佔大多數，他們無畏的公開實踐信仰。一九九零年五月，雖然警察阻撓，也有二萬多名教友前往河北東閭村聖母堂朝聖。過去幾年間，他們的主教會發出指示，禁止教友參與愛國會正式批准或控制下的禮儀。很多教堂因此而被空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些主教、司鐸和教友領袖聚集於距西安北邊約四十公里的三原附近，他們成立了一個「完全接受教宗領導、與普世教會共融」的主教團。但年底前，大部份的參加者已被逮捕。

一九八九年二月，共黨政府頒佈的第三號文件，目的透過孤立這些領袖來結束地下教會。這文件其實只確定已實施多年的壓制政策。自一九八六年開始，相繼出現一連串引起世界各地關注的驚人壓制行動：一九八六年五月，在橋寨，警隊暴力拘捕一班年青修生和修女；一九八九年四月，警隊流血鎮壓油通一條天主教村落；一九九零年六月，在趙莊，一名年輕司鐸、八位修生和六位修女被捕。雖然這些事件都發生於河北省，但逮捕司鐸、修女，在其他地方也屢有發生，比如在福建省。暴力行動根本不配合統戰政策的要求。政府承認的主教和司鐸都鼓吹更闊的宗教自由，包括為教宗祈禱和精神共融，以拉近他們與獨立自主教會的距離。愛國會

領袖也呼籲羅馬承認北京政府和官方認可的中國教會，他們希望自己的獨立自主能被羅馬承認，把他們視為真正的天主教徒，避免受到靜默教會主教的抨擊。

無論將來的進展如何，現今情況確能引起內部分裂和爭端。更可惜的是，這會擾亂教會內的生活。他們雙方都引用教會法典和梵二文件來維護自己忠於教宗和忠於教會。雙方都有不少善牧，他們在對待同一信仰中的兄弟姐妹上，都不願採取排斥的態度，因為他們都追求更崇高的忠貞，即忠於耶穌基督的福音和彼此相愛的誠命。

向中國教會致敬

雖然由於羅馬和中國政府間有著長期的誤會和衝突，以致產生混亂，但中國教會正勇往直前，進入一個充滿希望的將來。她給予我們一幅感人的形像，代表著一群曾為信仰而受苦的子民，其中有英雄和殉道者，有妥協折衷人士，也有曾經跌倒的人。由於國家對外採取更大開放和統戰政策，中國教會近十年有了長足進步。但這長進的活力來自她內在的靈修和她對過往四個世紀以來所接受的基督信仰的忠心。與海外天主教徒、尤其與華人教友的更多交流，將有助中國教會邁向圓滿的發展。她必將成爲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并帶給基督信仰史無前例的獨特貢獻。